

东方历史评论

历史的，批评的，审美的

ORIENTAL
HISTORY
REVIEW

许知远 主编 绿 茶 执行主编

特别策划

共和为什么失败：重返 1913

宋教仁遇刺，成为了民初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大小诸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主权，政治保守无为，国家四分五裂，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以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影像：苏联解体 20 年群像

东方历史评论

01

ORIENTAL
HISTORY
REVIEW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历史评论. 第1辑 / 许知远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95-3601-6

I. ①东… II. ①许… III. ①历史事件—世界 IV. ①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21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孟凡礼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 作: 杨 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45千字 图片: 8幅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现在，人人都会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倘若贝内德托·克罗齐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被滥用深感不安。他对于历史的丰富性、哲学意义的阐述，被我们狭隘化为功利性的需求。

这样一种“当下感”的历史陈述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王朝兴亡更替被描述成一场现代的成功学竞赛；微博历史层出不穷——这里面集中了现代人各种猎奇的喜好；还有对于“历史”遗物的极端狂热——流落海外的圆明园、莫高窟里的零散物件被高价买回国内，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见证。

这种历史功利化的趋势从媒体进入基础教育。课本编撰者无时无刻不想着为过去的事件寻找现代的意义。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诗歌都被认为具有“借古讽今”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的课堂里，历史事件的发展遵循“繁荣—屈辱—复兴”的线条，因此历史不仅为今日提供参考坐标，同时还提供了合法性：今天是最好的、最新的时代。

这场不自觉但又轰轰烈烈的历史现代化的过程，最终冲击到的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历史学家越来越成为一个暧昧不清的职业：如果所有的历史都是关于现在的，那么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什么专门的训练呢？史学著作也是如此，关

于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遗产、影响和意义。许多历史专业的学生的毕业论文都晦涩难懂，充斥着大量的专业术语和理论诠释。还有一系列盗用“历史”名称的作品：心理史，婚姻史，或是数码相机史，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是研究著作。其实，他们无非是使用了一系列过去积累的数据，为某种当下的行为或趋势的判断提供支持而已。

造成当下混乱状况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一是公众和很大一部分历史专业的学生从生活经验和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一种关于“真实”本身的激进的怀疑论观点。他们自豪于这种“不相信”的态度：大部分的记录都不可靠，大部分的历史都仅仅是为政治或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甚至，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写作和研究的。他们一方面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写作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对某种全新的诠释感到迷恋：甲午海战的失败不是整体清朝积弱的结果，而是因为因为没有聘任苏格兰海军教官，等等。20世纪以来个体逐渐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各种可靠和不可靠信息的充盈，为对于历史的怀疑论和虚无论提供了理想的心理土壤。

二是长期以来关于历史的功利主义的看法：当面对现实的紧迫时，历史似乎提供了直接的、快餐式的解决方案。如果希望知道“国家崛起”的奥秘，我们就需要了解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同时，观察苏联的解体，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失败，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避免错误的战略决策。诚然，对于过去的研究总会对今天的行为产生影响，但是过分功利的看法却导致历史事实的扭曲，思维框架的局限，以及对于今天的不恰当的假设。如果我们只关注“国家崛起”，势必会漠视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俄国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意义的 Nation。如果我们带着功利的眼光看待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我们就很难仔细认清当下的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说到底，政权的

兴替仅仅是政治史的一部分，政治史也仅仅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对于历史现代化、快餐化的表达，绝不应当成为受教育的公众对于历史作用的一般看法。布克哈特对于历史作用的评论应当一语点醒历史功利论的辩护者们：阅读历史，不是为了“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

历史学家自身也应为此种现象负责任：能够写出晓畅易读的历史小说的历史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学术机构对此种创作的价值评价远没有无人问津的长篇专著来得高。如果没有《三国演义》、《胡雪岩》这样的历史小说，或是《万历十五年》这样生动的历史作品，我们怎么能够逐渐建立历史感呢？我们怎么能够脱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过去呢？即使历史真的是由稻谷市场的价格波动和某些职业的“阶级认同”推动的，也没有理由拒绝荡气回肠的关于时代的描述、对于历史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细致描摹。除了一些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之外，很难在今天书店的书架上找到充满历史感的作品。

我们应有的历史应当是这样的：首先，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其次，历史写作和研究一定是对于当下的回应和参照，但是这种回应和参照是从容的。理论、概括和抽象化的历史结论，即使存在，也决不能以牺牲对于历史的具体感觉为代价。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不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最后，我们应有的历史的一部分应当是不完整的，可能是有错误的。这不是说历史学家

和编辑可以偷懒或是恣意妄为，这是说在关于写作和内容的严格的标准之下，我们依然可能会犯下关于事实的错误，或是做出经不起新材料检验的结论。只要我们严格遵守先前设定的标准，这些错误应当被看成是前进道路上的阶梯，而不是否定作品全部价值的依据。

《东方历史评论》要写作、编辑和出版我们应有的历史。我们明白，这是任重道远、困难重重的工作；但是我们同时也明白，对时代和我们自身的缺陷改正得越多，付出的努力越大，得到的敬意也就越多，这项工作的价值也就越大。19世纪的欧洲人熟悉他们的历史，因此尼采要努力加强现实和生活感的作用。今天的我们不熟悉自身的历史，因此我们要努力加强过去和历史感的作用。当然，我们的期待远远不仅于此，我们相信历史在我们内心中的力量和价值。

我们想以鲍斯维尔在《约翰逊传》中的一个故事为这篇短文作结，同时也激励历史学界的同仁。一次，约翰逊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他们讨论古典文化的价值。鲍斯维尔认为，古典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价值不大，没有它们，生活会依旧继续。约翰逊博士在一定意义上赞成，他说：“例如，这个划船的少年不知道阿尔戈号上最早水手的故事，但是他依然能为我们划好船。”他扭头问这个划船的少年：“为了了解阿尔戈号上的船员，你愿意付出什么呢？”“先生，”那个少年停下桨说，“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

目 录

—
发
刊
词
—
专
题

- i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
- 002 **共和为什么失败**
 方 罍 张晓波
- 008 **刺客与政客**
 张晓波
- 028 **民国囚徒**
 马 勇
- 039 **从借壳上市到破壳而出**
 章永乐
- 054 **被打断的宪制建国之路**
 受访：高全喜 采访：周绍纲
- 065 **魏玛共和的失败**
 撰文：理查德·埃文斯 翻译：方罍
- 076 **喧嚣与影响：对话蒂莫西·加顿·艾什**
 采访：许知远
- 091 **苏联解体二十年群像**
 摄影、撰文：苏里

—
访
谈
—
影
像

- 108 **历史的未来**
撰文：弗朗西斯·福山 翻译：管博为
- 120 **琉球的故事**
林泉忠
- 142 **文明大国的条件**
吴介民
- 149 **政府、地理与经济增长**
撰文：杰弗里·D. 萨克斯 翻译：胡新宇
- 160 **即将到来的第三帝国**
撰文：艾里克·霍布斯鲍姆 翻译：方罍
- 167 **日瓦戈的孩子**
撰文：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翻译：董帅
- 176 **“你爱中国，但中国不爱你？”**
方可成
- 185 **西哈努克、波尔布特与 1960—1970 年代的中国**
李丹慧
- 198 **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
沈志华
- 书
评
- 218 **他们如何造就帝国**
撰文：J. H. 埃利奥特 翻译：那须
- 226 **蒋介石之谜**
撰文：史景迁 翻译：胡新宇
- 235 **政见书情**
吴瑶

topic | 专 题

共和为什么失败：重返 1913

共和为什么失败

方 曷 张晓波

一百年前的 1913 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

“这里并没有诞生一个新‘全新的中国’。国家不会新生，只会演变。”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从结构上看，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特性，政治属性和中国官员的秉性并未改变。”

这是 1912 年的 12 月，离武昌起义已超过一年，清帝也已逊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的觉醒”的惊呼充斥在世界媒体上。人们着迷于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古老的君主国突然迈进共和制，民主的呼声压过了漫长的专制。

但对于濮兰德，这欢呼是浅薄的，中国的改变是表面的，甚至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很少有人比 49 岁的濮兰德更有资格评论中国的转变。自从 1883 年到中国，他做过罗伯特·赫德的私人秘书，担任过《泰晤士报》的记者，还被清王朝授予过四品官爵，而他在 1910 年与人合著的《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则一出版就被视作是理解中国的最佳著作。

他认定：“现在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美国人理解的真正共和国，有效率的共和政体并未建立起来。目前中国所呈现出的安静，绝不是由于中国民众对政治

状况表示满意。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根本就没有最起码、最基本的理解。”

不到四个月，濮兰德在纽约的悲观论调，在上海的沪宁铁路车站得到再明确不过的确认。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年仅31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

而在此前，新生的民国似乎还充满了希望。1912年年底，各地国会大选如火如荼，国民党与共和党角力选票。双方为获得议会胜选，招数出尽。最终结果还是更具地方实力的国民党系赢得大选，在国会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宋教仁随即从湖南至上海，沿途发表演说，阐明政纲，一再申述组阁之雄心壮志。

宋教仁的雄心来自他对于共和国的政治理念的信任。按照1912年修订的《临时约法》，国家元首（总统）实际上仅是象征性的最高领袖。也就是说，袁世凯尽管在1912年取得了总统之位，但仍规范在《临时约法》铸就的牢笼之内。如果一切按此逻辑，1913年在国会选举中大胜的国民党，势必将获得组阁权。从1912年南北妥协商定成立共和国，至1913完成首届国会大选，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一年多的时间，这个共和国创立的故事，在枪声中戛然而止。

随着宋案中主谋青帮首领应夔丞与国务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的公布，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直接牵扯到国务总理赵秉钧与总统袁世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法律派，当时试图诉诸常规的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但赵秉钧拒绝出席上海的听证会。随后，一般性法律手段也就没有能力审理这一案件。宋案进入了死角，它从一桩未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危机。它导致国民党与北洋派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2年，这两个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派系通过妥协与合作，完成了三届内阁的组建，度过了重重政治危机。两派之间的合作空间，被极大地撕裂了，双方之间的对抗性不断滋长。

紧随宋案之后的，是1913年“善后大借款案”。此案仍与《临时约法》设定议会主权相关。为解决辛亥革命及之后的财政紧缺，袁世凯政府绕开议会，单方面向四国银行借款。事情泄露之后，议会中国民党一系力量极为不满。借款，是政府解决时局的迫不得已，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绕开议会的借款本身又是违反宪法的。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9月，国民党败，二次革命失败；10月，袁

世凯获选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资遣回籍。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暗杀、政争、内战、解散国会、单方面立宪，民国政治急速脱离1912年政治大妥协的轨道，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这失败不仅是袁世凯、孙中山、宋教仁或是中华民国、北洋派系、国民党的失败，它似乎也是一个政治理念的失败。

二

1894年在檀香山创兴中会，孙中山明示要“创立合众政府”，并称兴中会会长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尽管兴中会没有明确提供创建共和制国家的意向，但在制度设计层面，是以美国共和制为旨归的。孙在1895年与日本领事的谈判中，再度陈述，革命成功之后将“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在这个意义上，孙对于革命之后的政治构架，是模仿美式联邦制共和国。

在1903年出版的、风靡一时的《革命军》中，邹容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而在晚清越来越激烈的革命情绪中，“共和”变成了最响亮的口号，变成了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崇拜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之后，“五族共和”等观念经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与《清帝逊位诏书》共同阐发，广泛传播于报纸杂志。这一点，也可以从民初国旗的制定上看得更为清楚，民初国旗，为五色旗，旗面按顺序是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主导政权的武人——北洋军阀固然对于共和体制及其操作缺乏了解，知识界同样对于什么是“共和”也并不清楚。

在这种意义上，民国初年的中国精英们，一定对于约翰·亚当斯的感慨深有共鸣又备感疑惑。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一心想模仿的美国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到了19世纪还在感慨，他“从不清楚”共和制到底是什么，而且还认为“过去没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共和制可能是指“任何事物，所有事物，或者一无所指”。

不过，对于行动者而言，定义从来不需要过分清晰。当 18 世纪末的美国人高声喊出“共和”，他们用此来针对英国的“君主制”，他们还努力让自己与追随者相信，这两种体制适合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拥护君主制的人喜爱安宁与秩序，而支持共和主义的则热衷于独立与自由。

这简单化的划分，适合于革命时的情绪。同样的，当晚清的革命党人推崇“共和”时，他们主要针对的是清王朝的君主制。倘若清廷代表着专制、腐败、无能、满人的权力垄断，“共和”就代表着一个有广泛的政治参与、法治的、多民族共存的新政治体制。这其中也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需求，这种新政体能增强国家力量，洗刷民族屈辱。

但如何将口号转化为现实，将舆论宣传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却需要复杂的程序。它不仅来自一小群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观念，也来自不同社会力量的响应。但就像濮兰德悲观的预言，这一切尚未发生。在结构上，袁世凯的中国仍延续着慈禧太后的中国。

三

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检视 20 世纪初试图转向共和政体的国家的动因，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因为贸易增长，欧洲各帝国的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之外，一个新知识分子共同体在各国内部迅速成长。城市的繁荣扩大了政治讨论的公共空间，书籍和学院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关于外部的知识，因为贸易而迅速发展的交通运输不仅带来了全球各地的货品、货币和书籍，还把热心求学的年轻人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这些年轻人在海外聚会、结社、组党，形成与他们国内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身份认同。这些历史现象使得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开始在欧洲以外的地方出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基于某种哲学原则的，为了完全参与这种社会生活，个人必须剥离他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经验，向着某种预设的目的努力。

这和旧制度之下的社会结构是对立的：在旧制度下，个人是以其职业和社会地位组织起来的，职业的高下贵贱，形成了权力分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为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准确的描述，社会关系可以被简化为阶级关系；而现在，这个知识团体是启蒙式的，是纯粹基于思想的。20世纪共和制度的设计者和实践者，无论是在土耳其、俄国、德意志帝国还是大清国，都深刻地受到这种思维与现实的影响。对他们而言，共和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实质上的主权，而是意味着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下，个人得以享受抽象的、思想意义上的平等——革命者要一个柏拉图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共和所遭遇的危机与它的起源直接相关：这是一个新知识分子共同体——一个“哲人社会”的参与者们建立的共和国；一方面，她需要迎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的挑战——在1913年，旧制度的阻力来自皇权、军队和地方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她也需要与在政治机构上发展出的共和模型努力调和——在1913年，这意味着以英国的国会制度为楷模的君主立宪。中华民国这个早产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既没有实力为旧制度颁发死亡证书，也无法迅速让共和政治的参与者统一签署她的出生证明。

一个湖南进步青年在1911年革命爆发后剪去发辫，加入当地的革命军队，事后回忆他当时对民国的期望时，他希望要一个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总长的民国。这种混合了知识憧憬、旧制度和机构民主的共和愿景似乎是当时许多人的期望：1912年2月16日，旧金山的中华商会在得知袁世凯被选为总统之后，一边准备庆祝新生的共和国的诞生，一边准备着孔子诞辰2463年的庆祝仪式。而1913年的一系列事件，不仅击碎了初生的共和国的政治前景，不仅打破了宪政民主在民国建立的希望，更粉碎了哲学社会和旧制度的调和的希望。在此之后，那个叫毛泽东的湖南青年在北京加入了“哲人社会”，希望以主义改造中国；旧金山的中华商会则又开始接纳革命失败的流亡者们；本来就对共和毫无信念的新总统，则对所有的共和机构越来越缺少耐心。

失败的革命派在1914年一方面走上了拙劣仿效北洋的道路，另一方面则是继续在现实里强化他们的抽象共和理想，搁置了对于民主机构、民主程序、宪法约束这种种手段的关注。孙中山组中华革命党，不再侧重五权宪法，而将革命分为军政、训政与宪政三个时期。孙中山“统率新旧同志”谋第三次革命，

“务以武力削彼暴政，先破坏而后建设，敷施方云顺序”。在孙看来，非常时期的革命，走宪政道路以遏制北洋集团，实属与虎谋皮，必以“武力”才有效。为使革命组织更为有效，中华革命党在《章程》中强调，“总理有全权组织本部为革命军之策源”、“本部各部长、职员悉由总理委任”、“凡进本党者必须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孙文党魁独裁，日后曾数度解释特以革命自期的基本原理：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以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就是服从我。

革命党中的另一巨子黄兴对孙中山之革命路径，颇有不满，曾讥讽此为“以人为治，羨袁氏之所为”。黄克强的话一方面指出革命党统治手段上越发独裁的倾向，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中心的革命派的转化无非是哲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哲人社会需要高度共识、统一目标作为其思想纲领。当君主制被辛亥革命打倒之后，他的目标是重塑中国社会种种更为微妙的结构。为了与其种种敌人做出区分，哲人社会必须收缩，必须从包容接纳一切边缘势力的联盟变成雅各宾俱乐部。这也是20世纪的土耳其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共通之处。

1913年年底，一个军政集团挣脱出牢笼，另一个竞争对手随后也开始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继续演化。共和国议会政治的机构和原则，双方都抛诸脑后，一个军政集团固然相信枪杆子握有政权，另一个孱弱对手同样只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

梁启超在面临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革命还是改革的选择时说：“法兰西自1793年献纳牺牲以后，直至1870年始获殍者，犹非其所期也。今以无量苦痛之代价，而市七十年以来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国更何在也？”这番在辛亥革命还未开始、共和尚待建立时发出的感慨没有被人记取，而是一语成谶。一百年前的1913年，是足以改变近代中国，完成新创共和国的一年，但恰在这一年，所有正面的力量，全部被历史甩出了。中国历史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距离宋教仁的遇刺已经一个世纪，而我们很难说，我们对于“共和”的理解加深了，而它的困境与挑战，似乎丝毫没有减弱。

刺客与政客

——1913年宋教仁遇刺案与民初政局

张晓波

刺杀宋教仁案情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汇聚到了宋案之中，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大败局。

1913年开春，新生的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新一届国会大选业已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此时，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问鼎总理，势不可挡。恰在宋教仁北上之际，却不幸遇刺于上海沪宁车站。

政党领袖身体的消亡，注定演化成政治事件乃至军事斗争。这看起来像是1913年事变逻辑链条中的第一个环节。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民国呈现出一片溃败之势。

但问题在于，“刺宋案”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疑问。到底是谁主使刺杀宋教仁，无论是当日还是今天，仍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而吊诡的局面，却在1913年并不清晰的“事实”上出现了。刑事案件演化为政治攻伐，进而上升为军事斗争，从而改变历史航道。

从这个角度来立论的话，刺宋案案情本身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政治力量，究竟是因何种动因汇聚到了宋案之上，并且由此导致了大分裂乃至大败局。